

谁来给瘫痪在床的老人洗个澡

“助浴”背后的尴尬和悲喜

姚大华的澡洗得隆重。四个陌生人围着他,接连给他换下棉衣、睡衣,然后是内衣、袜子,再遮上一层厚厚的浴巾。他本人就舒服地躺在紧靠阳台的单人床上。

妻子章正英则倚着房间门口,时不时和那几位陌生人搭话:换洗的袜子在床底下……这是干净的毛巾,白的是洗脸的,条纹的是洗脚的……他的腿瘫痪了……

上门助浴是起源于日本的一项为老年人服务的项目。雇主出一定的费用,助浴师会带着可折叠的浴缸、一系列洗浴用品,和能够保护老人安全的洗浴手法上门,在一到两小时内,搞定一次全流程的助浴服务。

这是姚大华第四次享受上门助浴。四个陌生人,其实也不再陌生。女助浴师聂积燕、男助浴师金启峰,还有一名助理助浴师、一名护士。

对于受客观条件约束,多年不能洗澡的失智失能或独居高龄老人来说,助浴的意义是不容小觑的。它带来的不光是身体的自由与解脱,更是一种久违的体面。

两年前,上海才刚刚出现这项服务,到目前,就已发展出三家上门助浴服务商。姚大华选择的福寿康公司,是其中之一。

走不进的“门”

折叠浴缸有近1米宽、1.5米长,需要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。姚大华家一楼的客厅,则早已腾挪出一片安置浴缸的空地。只要组装好浴缸和水管,打开热水器阀门,助浴师便可工作了。洗罢,浴缸放水,还能轻易收起。

在日本,绝大多数老年人家庭都能达到折叠浴缸的使用标准:两三平方米的空地,上下楼用的电梯。但同样一套设备,想要进入一些上海老人的家门,却没那么容易。

黄浦区的老式里弄,有人购买了上门助浴的服务。房间门头矮,楼梯间却又高又窄。抬着浴缸,金启峰每次都要左躲右闪地往上爬。竖着、侧着、斜着,一遍遍调换角度以求把浴缸塞进那道门里。

普陀区多是老工人新村。有个客户的房子,客厅、餐厅、卧室是同一间。浴缸搬进了家门,却没有地方放。搬走了餐桌、纸箱,又搬开了床,勉强放下浴缸,留给助浴师站立的空间只剩15厘米宽,根本转不开身。

“三分之一的客户家庭条件其实挺苦的。有时候一天洗6家,一半人家没热水。”聂积燕说。热水成了老人走进浴缸的阻碍。助浴师随身带的加热泵,烧一暖瓶水需要5分钟,把老人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用上,烧满一缸40度左右的洗澡水,需要近一个小时。

购买了助浴服务,签订了助浴合同,洗与被洗的关系正式成立。但即便浴缸抬进了家门,一些老人与助浴师之间,仍立着一堵厚厚的高墙。

第一次去杨浦区一位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助浴,聂积燕的内心像坐了一趟过山车。情绪稳定时,老人静静坐着,配合护士

做健康评估、换衣服。突然情绪变化时,老人紧紧裹着被子,甚至咬住被角,不让任何人靠近。一件T恤,穿脱了几次,老人还是没能成功地走进浴缸。

金启峰还经常会被客户关在门外,理由是他的性别为“男”。普陀区一位女性脑梗患者购买了助浴服务,患者丈夫见到金启峰第一眼,“啪”就把门带上了,“来个男的做什么”。

一些男性家属决不允许男助浴师靠近自己的妻子,即便是“搭把手”也不行。尽管根据日本引进的助浴规则,老人的隐私全程会被保护在浴巾之下,也只有同性助浴师可以负责隐私部位的清洗。但在上海,“让男人给她洗澡,我心理上过不去”,是男性家属相对普遍的心理状态。

有意思的是,如果是女助浴师给老年男性洗澡,通常不会遭到拒绝。

风险下的抉择

助浴一次的费用是450元。这在上海是相对普遍的行情。贵吗?听上去似乎有些贵。但不少老人是愿意掏这笔钱的。

徐汇区一位钱老先生,照顾瘫痪的老伴多年。子女皆孝顺,经常送来大量的补品,唯独给老人洗澡这件事,是一家子的难题。要知道,抬起一名75公斤重的老人,可不像扛起一个75公斤重的大包。想保证老人的平稳安全,需要两三个人同时均匀地施力,光靠手的力量还不行,需要有一定搬运技巧。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助浴组里,总要配置一两男男助浴师的主要原因。

家里人很难帮助一个瘫痪病人完成洗澡的动作,取而代之的,是简单的擦拭,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几乎每个长期卧病老人的房间,都弥漫着身体的味道、尿液的味道。味道的浓度可能取决于老人瘫痪的程度,以及日常护理照料的程度。如果有机会,许多老人都希望洗去这股味道,以及清洗时间长了粘连打结的头发。洗个澡,除了洁净感带来的身体的自由与解脱,还包括久违的、有人愿意靠近的体面。

虹口区的王阿姨瘫痪在床11年,她甚至忘记洗澡是什么感觉。第一次享受助浴,身体碰到水的那一刻,王阿姨几乎全身都在颤动。

从医学角度讲,老年人洗澡有诸多好处,但也存在一定风险。人体进入高温水中后,为适应环境,血流速度会加快,心跳也会随之变快。为保证助浴安全,每次洗澡前,一名护士会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。浴缸里,也始终插着一支水温计。身体健康者,水温严格控制在42度;如老人有心脏病、糖尿病史,温度还要再低一些。

“第一次洗澡的客户,十个人里有一半会存在紧张情绪。”聂积燕说。这时,有些原本血压平稳的老人,血压会忽而飙到高压160。问及原因,看到异性助浴师时的“害羞”情绪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是对自己身体承受力的担忧。相当一部分老人会或委婉或直接地向助浴师,我会不会洗个澡把自己洗没了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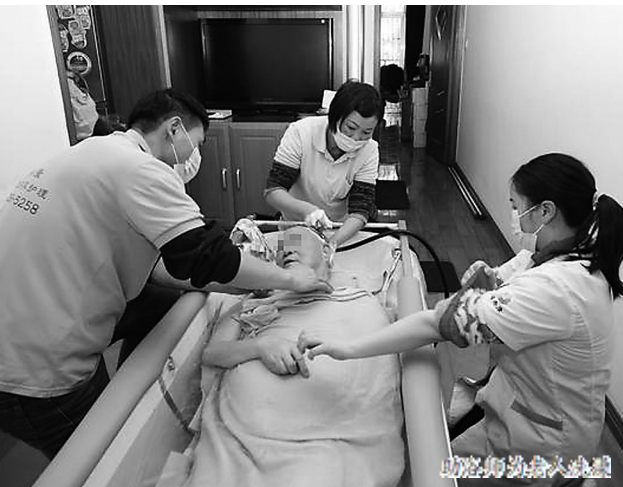
而一旦他们走进浴缸,放下



洗一次澡,需要诸多临时的设备



助浴师准备洗澡设备



助浴师协助老人洗澡

了关乎生死的忧虑,大多数老人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购买助浴的服务,费用似乎不是左右他们决定的关键因素。

久病床前那些事

助浴本身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。老人被移至浴缸内,助浴师按照特定的手法和力度,寻找着每个老人舒适与清洁的平衡点。从头洗到脚,再仔细冲淋一遍,不过几十分钟。算上前期准备的功夫,助浴师待在老人家里的时间,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小时。

但他们却几乎可以看到一段家庭关系的最隐秘处。

松江区有位老人,是一位认知障碍者。第一次洗澡时,她向助浴师们吐口水,着急了还动手打人。磨了一上午时间,她还是不愿意进浴缸。老人的女儿从一开始的好言相劝,到轻声埋怨,

最后气急败坏地赶走了助浴师。“她女儿觉得整件事情都怪我们,导致澡也没洗成,还耽误她做别的事。”实习助浴师聂狄说,这样的子女,在久病老人的家里很常见。“父母的病消磨了他们全部的耐心,满心的委屈总要找地方宣泄出来。”

多数老人助浴,是子女出钱,抑或子女持同意的态度。有的老人询问助浴师,洗一次澡要花多少钱?为免老人心疼,助浴师还会帮着子女隐瞒真实的价格。但相对立的情形也不在少数:有老人想花钱洗个澡,临到掏钱的时候需要征求子女的同意。退休金在子女手里,老人轻易也动不得。

洗一次澡,一个老人日常真实的互动关系也能一目了然。独居在奉贤区的林景怡,第一次购买助浴时,喊来了平日照顾自己的护理员大姐。根据林景怡的护理评估等级,护理员大姐每天会到家对她进行一小时的护理服

务。这日,林景怡特意改换了护理员上门服务的时间,让护理员大姐在洗澡时出现。她现在是林景怡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依靠。

有的老人,明明一个月只有4000元退休工资,却愿意拿出2000元来,每周洗一次澡。不为别的,每次洗澡,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光。四个助浴师在原本不大的屋子里走动,有人气。老人愿意把一肚子话趁机倒出来。助浴师走时,老人会依依不舍且慎重地约好下一次洗澡的时间,精确到几点几分,像对待一次重要的约会。

最后的守望者

一个月前,徐汇区的李锦妹女士走了。走之前,此前3年没碰过水的她,已经连着洗了8个月的澡。聂积燕是她固定的助浴师。

因尿毒症晚期,医生告知李锦妹的家属,病人只有3个月的寿命,临终的生命质量恐怕不会太好。丈夫为她做的最后几件事里,就包括签了一份定期助浴的协议。每个周六下午,聂积燕会带着队伍准时到。洗到第四次时,李锦妹的丈夫把助浴部经理林雪芹也一同请来,他想托付一件重要的事。

“老先生说,阿姨终究是要走的。如果哪天阿姨不行了,能不能不管多晚,请我们一定要来帮她洗最后一次澡,让她清清爽爽地走。”林雪芹郑重地允诺下来。像李锦妹这样向死而生的客户案例,他们此前遇到的并不多,这显然是一份无可推却的信任。

聂积燕清楚记得,去年夏天,住在静安区的吴先生曾委托助浴师上门为临终的父亲洗浴。护士上前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时,吴先生摆了摆手,掏出医院开具的出院小结。上面的意思很明确,病的日子不多了。吴老先生的两个女儿也陆续赶来,他们想用一次洗澡,让父亲体会最后的舒适和温暖。

在场所有人做好了“最坏”的打算,架起浴缸,打开热水阀门。“其实老人当时的状况已经不大好了。进浴缸前不停地呻吟,我们特意加快了洗澡的进度。理完发,擦干身体,把老人放在床上的时候,他长舒了一口气。他走了。走时头发是蓬松清爽的,脸也干干净净。”聂积燕说。

而李锦妹并没有等到这一天。意外发生在凌晨两点。丈夫犹豫再三,还是选择在第二天的上午11点,拨通了林雪芹的电话。“老先生说,小林,你李阿姨走了。没什么遗憾,就是最后的澡没洗成。”

事后,林雪芹反复纠结,今后还要不要接下这样的临终客户,要不要把临终沐浴做下去。这不光取决于市场,也取决于整个助浴从业者团队对职业本身的认知。

就在今年,福寿康公司将“天使沐浴”(临终助浴)作为一个专门的项目推向上海市场,他们想要探索一套符合本土习俗的仪式流程,用洗浴来维护一个老人在世间最后的尊严。

据上观新闻